

电竞行业劳动纠纷增多 业态法规制度亟待健全

□法治报通讯员 叶晓晨 宋雨露

从宣布上海筹办英雄联盟 S10 全球总决赛，到王者荣耀职业联赛在“上海主场”举办线上赛，再到 ChinaJoy 每年盛夏光临上海，上海已然成为电竞全产业链布局最全、核心要素最密集的城市。在产业链上游的开发环节，上海拥有国内 80% 以上的公司，涵盖了腾讯、米哈游、字节跳动、哔哩哔哩、大神电竞等国内外知名企业及及其子公司。

各大企业为占据行业竞争制高点，纷纷卷入电竞软件研发人才争夺赛。近年来，在法院审理的诸多竞业限制纠纷案中，不乏出现上述电竞巨头既有作为原用人单位起诉要求劳动者承担违反竞业限制义务的，也有在其他劳动争议纠纷案件中被指作为同业竞争企业隐蔽用工的情况。

此类涉高端技术人才案件逐渐呈现诉讼标的金额大、再就职认定难、规避手段隐蔽等特点。例如，诸多竞业公司为抢夺人才采取与竞业限制义务人建立隐蔽的第三方用工关系，更有以竞业限制义务人近亲属的名义创设新公司或者代持竞业公司股份的形式从事同业经营活动。

2023 年初，上海市徐汇区人民法院实质参与社会治理，就上海米哈游网络科技有限公司及其全资投资的三家子公司多起竞业限制纠纷案向涉案单位发送《司法建议》，相关企业高度重视、立即组织学习，并及时回函告知整改成果。米哈游公司表示作为被授予“上海市和谐劳动关系达标企业”称号的企业，今后将按照《司法建议》的指导意见，细化职能分工、加强内部宣教，同时完善竞业限制管理制度，提高劳动者保密意识。短短百余字的司法建议，展现了法官在司法之外的器识和格局；而一封回函，更是代表了企业对司法部门的感谢和严格规范运行的决心。

电竞赛道求速，但所谓“欲速不达”。审慎处理竞业限制纠纷案件，好比清理路

障，治已病；案结之后发送司法建议，好比划分赛道、设置“红绿灯”，治未病。为达到溯源治理效果，离不开“劳资共育，政企亲清，司法护航”的整体电竞营商环境构建。建议企业和劳动者在用工过程中注意以下几点：

审慎签署竞业协议，增强保密守约意识
竞业限制义务人应明确个人保密职责、商业秘密接触权限以及双方的权利义务。对于该类负有保密义务的人员，企业在招录时应签尽签竞业限制协议，日常管理中综合运用培训考核、个人对照自查、案例警示教育等方式强化意识培树，建立保密台账，加强员工思想动态分析，发现苗头性问题及时引导化解。

激活善用人才资源，促进合法有序流动
为更好实现人才稳定发展、企业创新勃兴的整合效应，企业需将人才的成长链与价值链高度匹配，将人才的认同感与归属感凝聚强化，将人才的高质量生命周期与企业高质量发展紧密融合。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同在人才竞争激烈的电竞行业，企业不愿被其他竞争对手“挖墙脚”，反之亦然。在人才引进时，企业应事先充分了解人才与原用人单位之间是否签订有竞业限制协议、是否仍在有效期内，充分引导或协助劳动者通过与原用人单位协商提前解除竞业限制协议等方式，避免违约和违法的风险。

健全业态法规制度，构筑竞业法治围墙
法治本身就是最好的营商环境。完善的法规政策体系，不缺口、不越位的法治意识，是形成人才创业、企业创新优质生态圈的关键。

《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一）》对竞业限制的主体、对象、期限、行为构建了基础性、概括性的规范框架，但现有竞业限制的法律规定在隐蔽性竞业行为判定、同业竞争关系认定、举证责任分配、违约金数额核定等方面尚有较大探索

空间。

政府搭台协调资源，抓好“头雁”部队建设

既然电竞新兴业态发展在前，政府支持和服务就须紧跟而上，能助其解难题、渡难关、复元气、增活力，是企业应对外部冲击挑战、提升自身竞争力的重要支撑。

以上海电竞业布局为例，腾讯、米哈游、字节跳动等头部企业办公地点集中在漕河泾开发区，多年来通过虹梅街道牵头，聚合辖区内企业、法律专业机构、青年企业家协会发起“漕河泾开发区法治论坛”。该论坛会集企业核心圈层，以“讲座+分享+实践”的模式提供专业性与实用性兼顾的培训课程，招招针对企业“痛点”“难点”。在后疫情时代，单方面的力量在解决问题上还是相对有限的，街道利用地缘优势建立区内企业“联盟”，一方面用更具互动性的方式引入各个利益相关方的专业能力和不同视角，另一方面把各类法律资源引到各家公司“楼下”，零距离观察、快速反应、贴身服务，形成法治化营商环境“最后一公里”合力。

下沉开展普法宣传，精准提供司法服务
为保障区域法治化营商环境，区法院定期调研走访区属文创电竞企业，深度了解企业生产经营情况和发展规划，参与相关企业对法律风险前期风控评估工作，把矛盾消解于未然，把风险化解于无形。

依托“甘棠树下”社区法官工作室平台，定期选派商事、劳动、知产领域的法官，为企业提供“问诊式”法律咨询，明规则稳预期，着力建设矛盾纠纷多元化解机制，引导市场主体依法依规健康发展。

如果说电竞正在成为“上海文化”的一张金名片，那么保障电竞研发人才的稳定就业和有序流动是夯实这张名片的重要产业根基。好的营商环境和司法环境就像阳光、水和空气，对市场主体而言须臾不可缺少。以营商环境之“优”、司法环境之“公”，促经济之“稳”、发展之“进”，上海在打造“全球电竞之都”高速路上必将行稳致远。

主笔闲话

推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在家庭落地生根



本期“案件写真”中，哥哥王某顺为了冒用弟弟王某利的学历信息求职，让弟弟王某利办理了两张身份证。两张证件，一张由弟弟王某利继续求学，一张由哥哥王某顺外出务工，这样的行为不符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应遵循的公平、诚信等原则，如此“你我”最终也导致了两兄弟对簿公堂。

从两兄弟的成长历程来看，初期互帮互助、共同奋斗，后期也收获了成功的事业，在物质方面并不匮乏。这套房子，就是两人共同奋斗经历的见证，但却也成为兄弟间墙、水火不容的伏笔。

法院对兄弟两人均做了大量调解工作，希望他们珍惜同胞情义，但双方仍坚持房屋归自己所有。这是一个家庭的悲哀，更为社会敲响了警钟：投机取巧，往往弄巧成拙；看重利益，终被利益反噬。“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兄弟反目，看似由利益导致，但从二人成长过程中的一次次选择来看，实则是源于价值观的根本错误。家庭教育中应当要注重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养，家庭和睦、家风纯正，亲情才会和谐。

王睿卿



“家用电梯”不规范安装 引发悲剧如何赔偿

吴大爷与妻子在农村生活，因老屋拆迁置换到安置房一套，包含地库和一楼。为方便上下楼，老夫妻俩想装一个“家用电梯”。散步时，吴大爷和邻居老周聊起这个想法，老周当即表示自己也有相同需求，在网上咨询过山东一家升降平台厂家，比起电梯便宜得多，一起购买还可以享受优惠。2020 年 4 月 26 日，吴大爷与老周一同前往山东，以每台 3 万元的优惠价格，向山东济南某设备公司购买了 2 台升降平台，合同约定该升降平台不包含外层门，需另行购买。入户安装完成后，吴大爷和老周为节约开支，并没有为升降平台安装外层门，就开始日常使用。

2022 年 8 月 14 日晚，吴大爷妻子在家中地库听到一声惨叫，急忙跑到一楼，发现吴大爷被卡在升降平台轿厢顶与楼顶之间，立即拨打了报警电话。吴大爷被送医抢救，经抢救无效，于同年 8 月 17 日因创伤性脑损伤死亡。吴大爷的亲属悲痛不已，将山东济南某设备公司及公司股东杨某诉至江苏省宜兴市人民法院，要求其赔偿吴大爷死亡造成的各项损失共计 98.04 万元。悲剧发生后，老周为自家升降平台安装了外层门。

因案发时没有监控录像，为进一步了解相关情况，承办法官至案发现场实地勘验。原来，吴大爷家中安装的升降平台较为简易，当升降平台轿厢停靠在车库时，轿厢顶与一楼地面处于同一水平面，因未安装外层门，也未设置警示标识，所以人可以直接走到轿厢顶，若此时升降平台又恰巧启动往上升，后果不堪设想。

在法官的主持下，双方最终达成一致调解协议，由设备公司及杨某向原告一次性赔偿 47 万元。

夫妻离婚牵扯借款 实质化解速结两案

有缘相识却为借款，情感升温搞闪婚。婚后未共同生活，却有着不间断的借款。见婚姻无望后，便诉至法院，要求离婚、归还借款。近日，黑龙江大庆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法院对这两起案件进行了实质化解，一别两宽各自生欢。

王女士家住广西，刘先生家住大庆。2013 年 5 月，刘先生和王女士在某婚恋网站相识，并互生好感。同年 8 月，双方见面，感情迅速升温并在广西登记结婚。在婚前，刘先生曾向王女士借款。婚后，刘先生虽在广西生活三个月，但双方并未共同生活。当年 12 月，双方再次发生争执，刘先生便以公司事务繁忙为由返回大庆。2016 年 1 月，刘先生电话告知对方到韩国打工。此后，刘先生未再到广西看过王女士，双方一直处于分居状态。其间，刘先生多次以公司经营困难等理由，向王女士多次借款，总计借款 40 余万元。2019 年年初，王女士告知刘先生，其再也没有经济能力帮助刘先生了，刘先生也就此断绝了与王女士的一切联系。见婚姻无望，王女士便向对方索要借款，但几经联系，对方就是拒接电话，并与其玩起“失踪”。无奈之下，王女士以民间借贷纠纷和离婚纠纷为由，分别将对方诉至大庆高新区法院。

民间借贷和离婚案件分别由法官王文娇和吴立翠主审。考虑借款是基于双方存有特殊关系，被告可能会对款项性质存在疑义，而离婚案件争议也是围绕 40 余万元借款，为实质化解双方纠纷，两名法官决定打包处理，进行一并调解。

鉴于双方分别在广西、大庆两地，在征求双方意见后决定实行“云间”审判。庭中，法官坚持实质化解原则，多次明法释理，最终，双方同意解除婚姻关系，并达成还款协议，即刘先生两年给付王女士借款共计 30 万元。

购二手车遇事故车请求三倍赔偿 法院判决解除合同退购车款

近日，安徽省广德市人民法院审理了一起信息网络买卖合同纠纷案件。

2021 年 8 月，邓某欲购置一辆二手车，经朋友介绍通过微信联系到何某。何某将一辆宝马轿车推荐给邓某，并告知其该车性能完好、未发生重大事故。邓某决定购买该车，并通过微信向何某支付了 4000 元定金，几天后支付了剩余的 32 万元购车款。何某在收到邓某的全部购车款后，将其中的 29.5 万元转给原车主荣某，作为购车款。

邓某在使用车辆过程中发现异常，遂委托鉴定公司对车辆进行鉴定，结果为该车为事故车。邓某认为，何某、荣某故意隐瞒车辆发生过事故的事实，误导其购买车辆，遂诉至法院，请求判决退还购车款、支付三倍赔偿金。

何某辩称，在车辆交易期间，何某为某汽车销售公司的工作人员，其行为产生的法律后果应由所在公司承担。

法院认为，在达成车辆买卖合同时，何某未获得公司的授权，应当认定何某是车辆的出卖方。因现有证据不能认定何某存在欺诈行为，从何某以 29.5 万元购车也可认定，其对案涉车辆发生过重大事故并不明知，因此，对于邓某要求何某支付三倍赔偿金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何某提供的车辆质量不符合要求，系根本违约。故邓某要求何某退还购车款及相应利息、赔偿车辆鉴定费诉讼请求，符合法律规定。但鉴于邓某实际已经占有使用车辆一年左右，对于保险费用和托运费，法院不予支持。综上，法院遂依法判决被告何某返还原告邓某购车款 32.4 万元及利息、赔偿邓某鉴定费 6000 元；邓某将车辆退还给何某。

王睿卿 整理